

展现新型的跨国移居者形象

——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的特征和意义

[韩]金惠俊

内容提要 加华作协作品选中的短篇小说,其素材和文体类型可谓多样。这与作家的出身地不同、创作经历各异及生活经验丰富有关,同时与加拿大对少数种族采取的包容政策及宽松的社会氛围有关。这些作家大多是第一代移民,因此他们的移民感受较多反映在作品中。作品时空背景多为加拿大,内容多讲述移民生活,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太空人家族”现象。作品中可以看到加华文学的某种独特的面貌:往往描绘适应移民生活比较好、逐渐成为加拿大人的华人,尤其表现了新形态的跨国移居者形象——他们把国籍看成是一种手段,且具有21世纪游牧民式思维方式。加华文学是一种少数人从事的文学,也就是说,作为今天正在形成的跨国移居者文学的一部分,具有冲击主流文学从而改变文学整体叙述的潜力。

关键词 加华作协 加华文学 跨国移居

一、加拿大华人的移居概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后开始实行激进的反移民政策,这不仅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反感,甚至也引来了国际上的批判。与此相比,加拿大的贾斯廷·特鲁多总理采取积极肯定的移民政策,例如他为吸引高专业技术人才开辟快捷通道而实行了“全球技能战略”(Global Skills Strategy),为引入新移民而发表了三年计划等等。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也并不总是友好和善的。这一点从加拿大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和态度可以看出来。华人的移居历史及文化现状同加华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①

加拿大华人最初的移居大约在230年前。据英国船长约翰·米尔斯(John Meares)的记录,1788年和1789年各有约50名和约70名香港及

澳门出身的华人乘坐他的船队,到达加拿大西岸温哥华岛的诺特卡湾(Nootka Sound)。他们主要由木匠和铁匠组成,从事小型船舶的制造及小规模的建筑等,早先定居在北美西北部地区,其中一部分和当地的女性结合建立家庭,还留下了后代。^②

大概70年之后,华人开始真正大规模地移居加拿大。1857年下半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弗雷塞河中发现了金矿,1858年6月旧金山地区的华工首先迁移过来,1860年以后香港和澳门等地华工也开始大量移居加拿大,从事淘金、开矿等各种体力劳动。从1865年起,淘金达到高潮后,因工作岗位不足等原因,逐渐形成了排挤华工的风气。1881年蒙特利尔至温哥华间的太平洋铁路开始修建,又重新涌入了15000至7000名华工,其中约4000人丧生于铁轨之下。

1885年太平洋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为了抑制华工入国,从1886年开始对移民到加拿大的

华人,征收 50 加元的“人头税”,之后税额不断增加,1901 年增加到 100 加元,1903 年猛增到 500 加元,但这并没有有效地阻止华工来加。加拿大政府在 1923 年通过了《华人移民法案》(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俗称“排华法案”,除了外交官、商人、留学生、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及离开加拿大不满两年的再入国华人之外,全面禁止华人入加。总之,20 世纪中期以前,华人为加拿大西部的矿山开发及铁路建设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成为加拿大主流社会种族歧视、偏见、蔑视的对象。当时大部分的华工都是男性,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难以来到加拿大,导致加拿大当时华工的男女人口比例相差悬殊,数十名男性住在一起的情况极其常见。^③

1947 年,因华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联合国在 1946 年发表人权草案等国际形势的变化,加拿大取消了排华法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力需求的增加,1967 年加拿大修改了移民政策,删除其中的种族歧视性条款,引进“评分制度”等,实行了相比之前较为宽松的新的移民政

策。1950 年以后,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华人开始大举移居加拿大^④,尤其是 1966 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和 1984 至 1997 年从签署归还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回归的十余年间,香港出身的移民剧增。与早期华工以体力劳动为主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华人移民大多生活在城市,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有一定的资产,其中还包括很多有专业技术的中产阶级。

1970 年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4 年起,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出身的移民开始移居加拿大。进入 80 年代,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留学生为首的大陆出身的华人移民开始增加,1998 年以后,大陆出身的移民数字超过了香港等地出身的移民,成为华人移民的主流。也因此,为了与早期的华工及 20 世纪后期香港、台湾、东南亚出身的华人区别开来,大陆出身的华人移民通常被称为“新移民”。

下面根据华人出身地的不同而做出的统计,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展现 20 世纪后期华人移民的变动趋势。

华人移民出生地统计(2016 年人口调查,25% 样品资料)^⑤

| 出生地 | 1981 以前 | 1981 - 1990 | 1991 - 2000 | 2001 - 2005 | 2006 - 2010 | 2011 - 2016 | 合计 |
|------|---------|-------------|-------------|-------------|-------------|-------------|--------|
| 中国大陆 | 56670 | 50885 | 148960 | 140605 | 123125 | 129015 | 649260 |
| 香港 | 47840 | 56275 | 88850 | 6120 | 4885 | 4975 | 208935 |
| 澳门 | 1480 | 1500 | 2240 | 185 | 185 | 155 | 5750 |
| 台湾 | 4785 | 6810 | 31535 | 7940 | 8395 | 4310 | 63770 |

据加拿大 2016 年的人口调查,加拿大人口为 35151728 人,其中就文化、血统方面来说,属于华人的有 1463240 人,约占整体人口的 4.16%。如果包括与其他种族社群重复回答在内的 342465 人,华人数字将增加为 1805710 人,约占整体人口的 5.14%。^⑥从这些人的出生地来看,大陆出身的占 52.3% (752650 人),香港出身的占 15.0% (215750 人),澳门出身的占 0.4% (5985 人),台湾出身的占 4.7% (68385),加拿大及其他地区出生的占 27.6%。^⑦从语言方面来看,使用华语的共有 1290100 人,其中使用国语/普通话/北方方言(Mandarin)的有 641100 人(48.53%),使用粤语

的有 594705 人(45.02%),使用闽语的有 28625 人(2.17%),使用吴语的有 11195 人(0.85%),使用客家语的有 8555 人(0.65%),使用其他语的有 36740 人(2.78%)。^⑧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华人的整体规模、不同时期的涌入趋势、出身地的构成等不仅密切关系到加华文学的内容和风格,还涉及发表版面和读者层面等多方面。也就是说,加拿大华人因出身地、使用语言及移居时期的不同,在法律、文化的身份认同及社会的身份地位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因素对加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多重、复合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现在加华文学的

行为主体可以说达 100 万名以上,如果考虑到大陆等地的华语使用者,其潜在的读者群规模更大。

二、加华文学的发展概况

一般来说,早期华人多是从事肉体劳动的华工,因此文学活动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华人的文学活动处于零的状态。^⑨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最初的加华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移民局建筑物上,即被称为“猪仔屋”的墙壁上留下的 19 至 20 世纪初的“壁诗”。1908 年在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市成立了移民局,而到 1923 年全面禁止华人移民为止,所有的华人入国者都要在这里等待入国许可,短到几天长到几个月。1977 年,这个移民局拆迁的时候,维多利亚大学的黎全恩(David Chuenyan Lai)教授在还未拆迁的墙上发现了华人诗文的一部分且记录了下来。在这之前,19 世纪初设在温哥华市的移民局也发现了类似的记录。从这些壁诗可以看到早期华人各种的生存现实,即:(1)早期华人迫于生计、宗亲移民的现实;(2)早期华人来加旅途的艰难和凶险;(3)华人来加后被拘“猪仔屋”的悲惨遭遇。^⑩

早期华人出于休闲、友谊、互助、信息交流等方面的需要,成立了以血缘及同乡关系为中心的宗亲会、同乡会等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发行的刊物中除了与团体的活动状况及财务事项相关的记录之外,还刊载了会员的文学创作。除此之外,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很多著名人士多次访问加拿大,留下了相关作品,如康有为《游加拿大记》(189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03)等。然而,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日新报》(1903)、《大汉公报》(1907)、《新民国报》(1909)等华文报纸或者《禹声月刊》(1936)等华文杂志发行之后。这些刊物主要刊载了以粤剧班本(粤曲唱本)、粤讴(广东民歌)、白话剧、旧体诗、坊间小说、散文、历史典故等为主的旧体文学作品,内容多以加拿大生活的感受和反应为主。^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新的华人移民开始涌入,文学创作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明显的不同是,如果说 20 世纪中期以前的作品属于旧体文学,那么这以后的作品主

要属于新文学。黄宽达的变化较好地展示出这种情况。过去他主要发表旧诗,然而 1953 年 11 月 3 日他在《大汉公报》上发表了《重逢》这一新诗,并将其改编成小说,于 12 月 5 日在同一报纸上连载。^⑫该时期创刊的《侨声日报》(1954)和《大汉公报》《新民国报》,到 90 年代为止,为加华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加华文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1968 年实施新的移民政策之后,华人的规模、文化素养、作品创作的意识、作家的集体活动、作品的公开发表、读者的欣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梁丽芳(2013)评价说六七十年代香港和台湾出身的华人作家为加拿大华文小说带来了第一个盛况。同时,她将该时期华文小说的特征概括如下:(1)小说时空的跨国化,尤其与出发地相比,更加重视移居地加拿大;(2)因生活环境的改变引起新的冲突,比如代沟冲突、文化冲突、种族冲突、情爱冲突等;(3)出发地文化与移居地文化的取舍、折衷、融合;(4)对人物的现实和精神上的旅程与探求主题的深入处理。

进入 90 年代之后,现有的作家更加积极进行创作,并且大陆出身的作家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新世纪后,迎来了加华文学的全新盛世。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作家人数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移民之前久负文名的作家,如洛夫、痖弦、叶嘉莹、胡菊人、梁锡华、亦舒、阿浓、潘铭燊、陈浩泉等;移民之后(更)有成就的作家,如卢因、冯湘湘、梁丽芳、东方白、葛逸凡、朱小燕、刘慧琴、曾晓文、孙博、余曦、笑言、张翎、汪文勤、宇秀、曹小莉等;擅长中英双语创作的作家,如李彦、林婷婷、黄俊雄、川沙、赵廉等。陈浩泉曾以比较活跃的 125 名作家为对象,按照出身地不同对其进行了划分,香港出身的有 70 人,台湾出身的有 11 人,大陆出身的有 41 人,其他地区出身的有 3 人。当然,如果包括赵庆庆、梁丽芳、刘红林等研究者零星介绍的作家在内的话,这时期加拿大华文作家的数量更多。

其次,作品的出版数量大幅增加。比如张翎的《金山》(2009)^⑬及上面提到的作家们的为数众多的个人作品集多到难以一一列举。同时,各

种作品选集也相继出版,如《枫华文集》(1999)、《白雪红枫》(2003)、《西方月亮》(2004)、《叛逆玫瑰》(2004)、《枫情万种》(2005)、《枫雪篇》(2006)、《旋转的硬币》(2007)、《枫情》(2007)、《枫雨同路》(2009)、《漂岛》(2009)、《芳草萋萋》(2012)等。又如,《香港文学》《文综》分别分两次出版了特刊等,很多文学刊行物都在关注加华文学,最近还出版了《当代加拿大华裔作家作品赏析》(2017)作为大学教材。

加华文学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华文文学》(汕头大学)刊行了“加华文学专号”(2006年第4期)和“加华文学专辑”(2007年第5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也分三次刊行了“加华文学研究专辑”(2010年第2、3、4期)。在CNKI上单以“加拿大华文文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话,可以检索到200条,其中排除相关性比较低的条目,至少有100篇以上的论文。而以“张翎”为关键词而进行检索,单是硕博学位论文涉及的就有64篇。

三、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的多种面貌和特征

(一)创作的艰难和作品的多样性

加华文学的发展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立的种种文学团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颇有知名度的约有10个左右。例如,由作家组成的团体有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1987)、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1991)、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1993)、加拿大中国笔会(1995)、加拿大华人笔会(2000)、加拿大华语诗人协会(2002)、大华笔会(2005)、渥太华华人写作者协会(2007)、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2009)等,和其他领域共同组成的团体有三维艺术家协会(2000)、漂木艺术家协会(2006)、亚裔作家工作室(Asian Canadian Writers' Workshop,60年代末)等。其中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加华作协)在艰苦的条件下,持续展开了许多活动,推动了加华文学的发展。加华作协的会员数截止至2018年大约有120人。到目前为止,出版的作品集有加华作家文集4种、加华作家系列丛书9种,此外,断断续续发行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有《加华文学》《加华作家》《枫雪篇》专栏等。

加华作协的各种作品选中刊载的华文短篇小说共有53篇(作家30位)。^⑭加华作协创立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这期间开展了许多活动,而且自创立以来,会员数不断增加。总数可能不是很多,可是如果对加华作家恶劣的创作条件有所了解的话,就应该充分理解这个数量其实并不少。加华作家除了少数之外,基本上都不是专业作家,他们大多以移民的身份居住在加拿大,面对生活的压力,长期而系统地从事创作极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作品发表的版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⑮特别是加拿大地域广阔,加华作家们散居各地,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们的作品收集起来编辑出版是件非常困难的事。^⑯因此,事实上加华作协作品选中刊载的华文短篇小说篇数不能算少。

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作品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是与这些作品的篇数相比,素材、技巧及文体比较多样化。从素材方面来看,描写华人移民生活经验的最多,但描写其他内容的也颇多。《冬元》(陈丽芬)、《瓶》(张翎)、《沉茶》(张翎)、《猫仔》(阿浓)等讲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生活,同一一般的中国作品没有很大的差别。《永久的秘密》(阿浓)、《美丽的错误》(林婷婷)等,与作品的时空背景无关,从更深的层面上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描写对生老病死的感受。从技巧方面来说,基本上以现实主义叙事为主,但也有如《地久天久》(李彦)、《炉边传奇》(卢因)、《罗医生的床》(笑言)等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品。除了传统的小说文体以外,《入门》(慧卿)部分地采用了剧本的形式,《一个士兵之死》(刘慧琴)、《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宇秀)具有报告文学或散文风格,《胖子和我》(曹小莉)比较类似于自传体。另外,《胖子和我》(曹小莉)插入了诗歌,《温哥华的私房菜》(也斯)运用甚至戏仿(parody)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写法。^⑰当然与外形上的素材、技巧及文体相比,作品内部蕴含着的各位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及文学观更为丰富多彩。

这些作品之所以展现出如此多种面貌,有各种因素。首先,作家的出身地各不相同,分别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及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他们的创作经历和生活履历也各不相同。另外,这

可能也与加华作协的多元、包容的氛围有关。这一点从加华作协的会员构成上可以推测出来。如,除了华人华文作家之外,还有 Wayson Choy (崔维新)等华人英文作家,甚至更有如 Jan Walls (王健)这样的非华人加拿大学者。此外,这一点还体现在作品的选取上。Wayson Choy 的《玉牡丹》(*The Jade Peony*, 胡意梅译)是被翻译过来的作品,曾在加拿大短暂居住过的也斯的《温哥华的私房菜》及移民加拿大后又回到出发地香港的颜纯钧的《自由落体事件》也被刊载了进去。如果再往前进一步想,这可能还与加拿大对少数种族的宽容政策和社会氛围有关。作品中“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大家庭”(汪文勤《姓甚名谁》),“温哥华城市平静地发展,如一湾清水,……待久了内心自然变得平和,与世无争”(曹小莉《胖子和我》)等语句应该不是空话。

(二) 移民经验的表现

加华作协的作家多为第一代移民,因此他们的短篇小说大多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他们在所居地经历的种种体验。首先,作品的背景大多是加拿大^⑩,作品的素材也大多描写移民的生活。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小说几乎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空间背景是加拿大。事实上,很多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知道空间背景是哪里。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大概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作家们在创作中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是加拿大华人华文小说。第二,作家们预设的读者是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而不是居住在加拿大或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作家想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是刺激读者对华人世界产生好奇心而采取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这是为了强调华人华文小说作品的特殊性而采取的一种叙事谋略。

这种描写移民生活的作品当然呈现出华人华文小说所具有的共同的内容面貌,如到达移居地后产生的陌生与激动、尴尬与安居、经济上的不稳定与稳定、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确保、定居的失败与成功、语言及文化上的不适应与适应、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及从华人社会得到的帮助、对移居地

的不满与满意、对移居地和出发地的复杂的反应,等等。比如《严冬》(金依)和《自毁》(张初)这两篇作品讲的都是移民之后发生的事情:妻子比较顺利地超市找到了工作,维持全家生活,丈夫却失业了或者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的社会身份因此而下降,并且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后来竟然发展成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结果不但毁了自己,还毁了家庭。《寻梦园之军垦农场》(陈丽芬)中女主人公放弃了在中国大陆富有的生活,而作为投资移民来到了加拿大,没想到到了加拿大之后,她完全破产,最后丈夫也死于癌症。当她经历了这一系列人生巨变之后,她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类似经历,这在给她自我安慰的同时,又让她立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宇秀)中叙述者是华人移民,她是作家,同时也在商店里当店员,拥有两个名字、两个身份,由此产生了源于这之间的认同焦虑。

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秦香莲”之演出》(冬青)、《再生花》(冬青)、《温哥华的月亮》(陈浩泉)、《鸭》(陈华英)、《入门》(慧卿)等小说中探讨的“太空人家族”现象及因此而产生的家庭内部的矛盾、婚姻的破裂及女性的自立等问题。虽然“太空人家族”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是加拿大作为香港出身的移民的聚集地,这一现象比较显著。这同香港出身的中年男性华人大举回流有关。华人在加拿大无论是财富创造方面还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上升方面都很受限。相反,香港 1997 年回归之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跨国企业对海外人才有了新的需求。这就使得很多人选择重新回到香港发展,“太空人家族”由此而生。^⑪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加华文学更为深入地表现了“太空人家族”现象所具有的复杂的意义。婚姻破裂可以说是“太空人家族”的后果之一,而上述这些作品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处理得比较简单。大部分都描写回流后的丈夫又有了别的女人,尽管现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但是仔细研究作品,会发现并不单纯如此。移民后除了夫妇间肉体上的、感情上的疏远之外,从根本上来说,出发地和移居地间的社会和文化

差异也导致家庭成员的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变化。从这一层面来说,《温哥华的私房菜》(也斯)尤为值得重视。作品中一对夫妻为了让丈夫回流而假离婚,丈夫回香港工作,妻子留在加拿大照顾孩子们,夫妻间发生微妙的变化及矛盾。其实,这追究起来起因于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在家庭中担任的角色等制度和观念的变化,也就是说,这根本上归因于出发地和移居地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

(三) 身份认同意识的变化

仔细研究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会发现除了华人华文文学中比较普遍的特征外,它们还具有加华文学自己的特色。加拿大没有太大的社会变化,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安定。从大的框架来看,华人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比较平稳地适应这个社会,他们不仅在法律层面上,而且在文化层面上有可能渐渐变成一个真正的加拿大人。从这个角度看,刘慧琴的《枫回路转》(2003)和《一个士兵之死》(2009)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前一篇小说通过讲述华人移居者的悲惨死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对移居地的不适应和对出发地的认同感;而后一篇小说可以看成是通过对被派兵到阿富汗而战死的(白人)加拿大人的哀悼,表达了把移居地加拿大看作自己的家园而做出的积极努力。有些作家也在无意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这一点。比如,《亲情》(葛逸凡)描写加拿大中小城市的温馨的日常生活;《鼯鼠为媒》(陈华英)讲述年轻的移民与留学生相遇,建立了幸福家庭的故事;《彼岸的时光》(林楠)讲述移民婚姻,由三代八个人组成的两个家庭幸福的生活;《卖车大王爱德华史密斯先生》(曹小莉)描述了华人房东和非华人房客们间的故事,尽管他们出身、国籍及种族各不相同,却能够惺惺相惜。

加拿大华人华文小说中出现的这种对移居者生活态度的差异缘于何处呢?我认为大概与两种情况有关。一方面,应该与加拿大全体华人集团对自身作为加拿大人的强烈的认同感有关。当然,这反过来看也反映了加拿大对待少数种族的多元文化政策及社会整体的宽容氛围。另一方面,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与整体华人集团的状况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与作家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简言之,从出发地和移居地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的地区来的作家,或者居住时间较长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对移居地加拿大的期待和适应,甚至还表现出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只是关于这些方面,尚需要做更详细的讨论。^⑩

(四) 21 世纪跨国移居者形象的出现

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值得关注。过去的移居者到了移居地后,要么仍然沿袭出发地的语言和文化并试图将其移植给原住民,要么与此相反,基本上放弃出发地的语言和文化而向原住民学习并努力被同化。然而今天的移居者,与过去的移居者相比,他们具有一种随时变化的可以移动的动态身份认同,同时对待语言和文化态度等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加华小说在这一点上有所表现,下面稍作说明。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影响下,劳动的移动、交通的发达、传播媒介的发展等,使得跨国移居者在数量上增多,空间上扩大,时间上更频繁,现象上更普遍。此前的移居者主要以殖民、难民、移民的形态出现,而且基本上永远回不了出发地。与此相比,新型的移居者相对来说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出发地和到达地(包括停留地)之间,而且充分利用两边(多边)的资源,因此,今天的跨国移居者们把国籍看成是一种手段,他们具有 21 世纪游牧民式的情感和思维方式。^⑪其中华人,在大陆、台湾、香港与既有的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网下,尤其是近来“中国崛起”的情境下,这种情感和思维方式更为明显。

《他是我弟弟,他不是我弟弟》(陈浩泉)中香港出身的华人父子和台湾出身的华人母子在加拿大结合,组成了新的家庭。父母由于事业上的原因,频繁地往返于大陆、台湾、香港、温哥华之间,孩子们——两个异腹兄弟作为加拿大人中的成员与各个种族出身的人一起生活在温哥华。当然他们混用各种语言,甚至家人之间交流时也混用各种语言(台湾和香港的方言、普通话、英语)。他们似乎随时有可能再次改换自己的国籍,从这个

角度来看,他们好像没有属于某一社群的认同焦虑,尤其是更无法推测这两个年幼的异腹兄弟将为自己做怎样的定位。就像这篇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今天新型的跨国移居者充分地利用自身具有的所有资源,我们无法具体说出他们具有哪一国家的特征或种族认同,也无法称这种移民为传统意义上的华人离散者。换句话说,虽然这一作品表述得不很明确,但多少向我们展现了新型的跨国移居者家庭里正在形成一种具有新形态的身份认同者。《老兵》(诺拉)也与此有些关系。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其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他们间的结合说明了今天的移居者处在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文化状态之中,各自的认同不再限于特定的国家与种族,如中国大陆出身的老李和他女儿就是如此。老李早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后被收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韩战被俘后,以反共俘虏的身份被释放,去了台湾,再后来四处辗转,最后在萨摩亚定居下来。不仅老李自身经历复杂,他的女儿还在高中毕业之后加入了美军。

四、加华文学的意义和课题

加华文学是一种少数人从事的文学,相对于以英语和法语为主的加拿大主流文学来说是如此,相对于以汉语为主的中国文学(大陆、香港、台湾文学)来说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加华文学具有给主流文学带来冲击并促使其变化的潜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正在形成的跨国移居者文学的一部分,它也许具有改变整个世界文学格局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可从两方面进行讨论。

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描写了生活的多种层面,包括出发地中国没有的或者即使有却不方便写出来的。比如《亲情》(葛逸凡)、《开工第一日》(刘慧心)、《卖车大王爱德华史密斯先生》(曹小莉)、《枫回路转》(刘慧琴)等作品描写了华人与处境相似的少数民族移居者间的同情、华人与主流社会群体间的友爱、以及华人与华人间的榨取等。《杀人游戏》(笑言)批判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对华人 and 黑人结合的混血子女的偏见,进一步体现了华人自身在再生产着主流白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首先充分向华人华文文学的读者(包

括中国读者在内)证明了华人华文文学并不单纯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不是“中国梦”的宣传物。^②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中国人(汉族)与华人之间的关系、移居地主流社会与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仅是移居地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也在内)的主流社会与少数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积极探讨的可能性。

可是要想把这种可能性具体化,需要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有意识的努力。首先,对华人的处境和地位有一种宏观的把握,通过作品把它们表现出来。大部分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对华人的思考局限于出发地中国、移居地加拿大及两地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视野放大一些,站在全球跨国移居者群体的层面上看华人问题,也就是说,把华人看成是超越国家和种族的新形态人类群体的一部分,会不会就能创作出新层次的作品呢?其次,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家,都不必束缚于现存的语言和技巧,而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以便可以更好地表达作家自己的新经验、感受和观点。众所周知,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个说意地绪语(Yiddish language)的犹太人,他生活在捷克布拉格,文学创作语言不是捷克语而是德语。换句话说,他没有采用与以德语创作的德国人(在德国的日耳曼人)相同的方式写作。这一点对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他的作品之所以优秀,固然源于他深厚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而他的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对形成和表达他的思想和感受应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应该更为自信地、积极地探索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如笔者这样的非汉族/非中国系学者的研究和华人作家的华人华文小说创作有某种相似点乃至共同点。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经验、文化理解的水平、使用汉语的熟练度和中文著作的阅读量等各个方面,与中国学者(汉族学者)相比,是相当不足的。那么,非汉族/非中国系的学者的研究到底有哪方面的意义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比较自信地提出来的,就是非汉族/非中国系学者的观点和感受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

与中国学者(汉族学者)的不同。如果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华人作家的华人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以及居住地的主流文学(如同加拿大的英语和法语文学)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的。

换句话说,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的文学没有必要因袭现有的中国文学/中文文学或者加拿大文学,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在不自觉中再生产出所谓的东方主义。加华作协华文短篇小说让人觉得作家好像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读者假设为中国的读者。这样,一部分作品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描写读者所希望看到的异国风情,甚至还捏造异国幻想,例如《警探理查德逊》(张翎)的讲述方式颇为接近白人枪手和北美印第安酋长女儿间的爱情故事,这几乎是一种正义的白人男性救助无知的东方女性的故事。

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到底应该将谁假设为自己的读者?作为一个作家,谁都想拥有更多的读者,从这一点上来说,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把全世界的中文读者(特别是中国的读者)假设为自己的读者并没有错。只是我觉得有必要为把加拿大的华人读者(乃至全体华人)作为第一阅读对象而努力。另外,无论是加华作协还是加拿大华人社会都不仅要为华文教育的普及,还要为华人文学作品的普及努力,为华文文学读者范围的扩大、华人华文文学作家的培养、华人华文文学发表版面的增大等而做出努力。当然这不是说过去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加拿大华人和华文的影响力将会更大,尤其是近来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强力支援。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效果会更为理想。因此,加拿大华人华文作家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加拿大华人的水平上,也不能简单地被中国(大陆)的文化外延的意图所牵制。换句话说,加华作家应该将自己体认为中国(汉族)出身的加拿大人,乃至新型的跨国移居者中的组成成员——华人,应该将加华文学定义为加拿大文学的一部分,乃至华人华文文学的一部分。^③

①以下关于加拿大华人移居变迁相关的叙述主要综合参考了金斗燮《中国人和韩国人移民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成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加拿大温哥华事例研究》[韩语](《韩国

人口学》第21卷第2号,韩国人口学会,1998年,第144-181页)、吴金平《19世纪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及其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2卷5期,中南民族学院,2002.10.30,第67-70页)、王奕轩《从统计数据看当代加拿大华侨华人的人口特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2014.12.1,第37-48页)、赵庆庆《对加拿大“猪仔屋”和先侨壁诗的历史解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4.09.25,第20-25页)等内容。

- ②以上参考 John Meares (1790), John Meares, Voyage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 From China to the North West Coast of America (London: printed at the Logographic Press and sold by Jo Walter, 1790, pp. 2-3) 及 Appendix No. I, No. X. 关于华人留下后代这一点,参考赵庆庆《对加拿大“猪仔屋”和先侨壁诗的历史解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4.09.25,第20页),更详细的内容可参考 Anthony B. Chan,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1983)。
- ③加拿大华人男女比例为1887年70:1,1921年25:1,1941年10:1。具体可参考梁丽芳《试论前期加拿大华人文学活动的多重意义:从阅书报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2011.12.20,汕头大学,2011.12.20,第52-60页)。
- ④比如,1956年到1965年期间,22000名华人移居加拿大,其中香港出身的占66%,台湾出身的占21%,其他亚洲地区出身的占3.2%。具体可参考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第352页),转引自梁丽芳《试论岭南人对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起源及形成的贡献》(《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3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0.9.25,第7页)。
- ⑤Statistics Canada, “Immigrant population by place of birth, period of immigration, 2016 Census - 25% Sample data.” 以下关于加拿大人口的各种统计使用了加拿大联邦统计厅 (<https://www.statcan.gc.ca>) 的资料。
- ⑥Statistics Canada, “Ethnic Origin, both sexes, age (total), Canada, 2016 Census - 25% Sample data.” 加拿大实施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2016年人口调查的种族分类中,华人大体分为 Chinese 和 Taiwanese。
- ⑦Statistics Canada, “Citizenship (5), Place of Birth (272), 2016 Census - 25% Sample Data.” 其他地区出生的华人统计没有特别指出,不得已把他们算入了加拿大出生的华人中。一方面该统计的合计数字和前面的“华人移民出生地统计”的合计稍微有些差异。这好像是因为两边各抽取了25%的样品为根据而估算引起的。
- ⑧Statistics Canada, “Language Spoken at Home (263), Single and Multiple Responses of Language Spoken at Home (3), Mother Tongue (269).”

- ⑨进入20世纪,早期华人的后裔及受早期华人的影响从他们家乡而来的新入的移民,他们相对来说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化。这一点从加拿大华文报纸销售量可以看出,加拿大华人人数1931年为46519人,1941年为34627人,这期间加拿大的华文报纸贩卖数为数千份。具体,参考梁丽芳《试论岭南人对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起源及形成的贡献》(《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3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0.9.25)、《试论前期加拿大华人文学活动的多重意义:从阅书报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汕头大学,2011.12.20)。
- ⑩以上关于壁诗的叙述与评价主要参考赵庆庆《对加拿大“猪仔屋”和先侨壁诗的历史解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4.09.25,第20页)。Paul Yee, *Saltwater Cit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Vancouver: Douglas and McIntyre, 1988, pp. 52 - 53, p. 55) 有更为详细的说明。此外, Karen Cho, “In the Shadow of Gold Mountain”, https://www.onf.ca/film/in_the_shadow_of_gold_mountain 也有相关视频。
- ⑪以上以报纸、杂志为中心的早期华人的文学活动参考梁丽芳《试论岭南人对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起源及形成的贡献》(《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3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0.9.25)、《试论前期加拿大华人文学活动的多重意义:从阅书报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汕头大学,2011.12.20)以及陈浩泉《加拿大华文传媒与加华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2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10.06.25)。
- ⑫梁丽芳评价说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年轻的华人对学业及人生的彷徨,她认为这是最初的加拿大华文小说,参见梁丽芳《加拿大华文小说第一波:港台作家们的开拓角色》(《华文文学》2013年第3期,汕头大学,2013.06.20,第75-80页)。另外,李未醉认为1957年香港的《文艺新朝》发表的冷凝的《蒙特利尔之冬》是最初的加拿大华文小说,参见李未醉《加拿大华裔与华文文学》(《八桂侨刊》2005年第1期,广西华侨历史学会,2005.2.28,第17-18页)。
- ⑬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备受瞩目,在韩国也翻译出版。张翎著,朴明爱译,《金山》[韩译本],(首尔:金土,2010)。
- ⑭这个数字不包括会员个别出版的作品或《香港文学》“加拿大华文作家作品展”(2004-7)等外部刊物中刊载的作品。
- ⑮曹小莉在《胖子和我(下)》的结尾中叙述者这样写道,“这年头,谁给我稿费呀,谁还看这种东西呀。我写了十张纸,扔在抽屉里十几年,……”,而作品最后部分作家也这样追记道“草稿一九九九年,二〇〇九年打入电脑,得见天日。”
- ⑯这一点在各本作品选中刊载的陈浩泉的《编后记》和《编者前言》中可以窥见一斑。
- ⑰也斯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传奇或章回小说的形式,从主人公的名字到小说的内容,不仅到处引用或戏仿《薛平贵》或《王昭君》等故事,而且还模仿1940-60年代香港特有的混用文言文、广东话、国语的三及第文字。
- ⑱除了中国大陆(《瓶》《沉茶》《冬元》),香港(《猫仔》《父女情》《自由落体事件》),还有场所不明确的(《永久的路密》《遗孀》《老兵》)等作品外,80%以上作品的空间背景是加拿大。
- ⑲华人及韩人的“航天员家族”现象有多种原因,但基本上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确保收入稳定)及文化方面的原因(子女教育)。华人(特别是香港出身的华人)的情况,除了在移居地经受的各种困难之外,还是出发地的社会安定、经济增长及因之而生成的机会的增多、加拿大的双重国籍制度及移民义务居住期限的宽松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关于“太空人家族”现象和香港出身华人的回流,一部分内容可参考尹泳洙《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移民的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的形成与变迁——以温哥华的事例为中心》[韩语](《中国现代文学》第68号,(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4.3,第183-215页)。
- ⑳梁丽芳也这样说过,“这些小说(1960-70年代第一波加华小说)以加拿大为故事背景的占大多数,这跟后来第二波的新移民小说中人物与原居地有相当瓜葛不同。……因为这些作家的生活背景比较国际化,小说很少描写人物到异域后的陌生感和文化震惊,……”参见梁丽芳《加拿大华文小说第一波:港台作家们的开拓角色》(《华文文学》2013年第3期)。
- ㉑金惠俊(2011)。金惠俊:《华人华文文学研究试论》[韩语],《中国语文论丛》第50辑,(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9,第77-116页。
- ㉒2016年11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办)。在开幕式和主旨发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人士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高层人士(吉狄马加,叶辛)共同强调的有两点,即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和通过华文作家的作品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可是他们所谓的“中国故事”意指(发展中的)中国的情况,“世界”(实质上)意指西方。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大陆以外的华人作家200多人和大陆学者100多人,还有少数像笔者这样的外国学者。
- ㉓据陈丽芬、梁丽芳、青洋等发来的邮件(2017.09.03-05.), 笔者的口头发表(2017)之后,加华作协就笔者上述的批判而展开讨论,并且商讨具体的实施方案。

作者简介:金惠俊,韩国釜山大学教授。